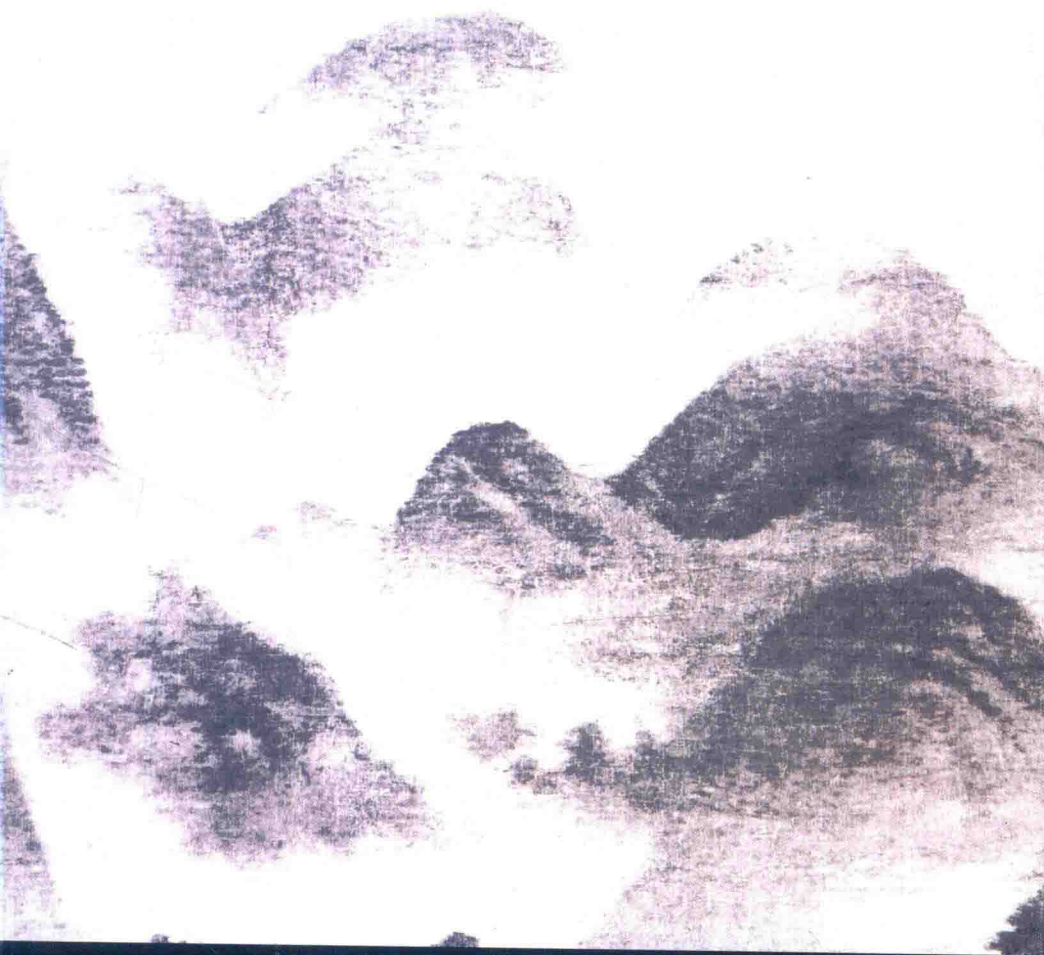


guide



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

尤金·W. 霍兰德 (Eugene W. Holland) 著

周兮吟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导读

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

*Deleuze and Guattari's A Thousand
Plateaus: A Reader's Guide*

尤金·W. 霍兰德 (Eugene W. Holland) 著

周兮吟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美)尤金·W. 霍兰德(Eugene W. Holland)著;周兮吟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11

(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

书名原文: Deleuze and Guattari's A Thousand Plateaus; A Reader's Guide
ISBN 978-7-5689-0216-8

I. ①导… II. ①尤…②周… III. ①吉尔·德勒兹—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4155 号

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

DAODU DELEZI YU JIATALI QIANGAOYUAN

尤金·W. 霍兰德 著

周兮吟 译

策划编辑: 邹荣 任绪军 雷少波

责任编辑: 邹荣 版式设计: 邹荣

责任校对: 关德强 责任印制: 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易树平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 (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正前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90mm×1168mm 1/32 印张: 6.75 字数: 160 千 插页: 32 开 2 页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89-0216-8 定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guide

致 谢

我愿感谢以下在本书写作计划展开的各阶段提供有益反馈意见的所有人：参加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2010）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2012）的研讨班的学生们；2010年在普渡大学召开的哲学与文学研讨会的组织者与参与者；2011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德勒兹研究研讨会；2012年在中国开封召开的国际德勒兹研讨会的组织者与参与者；莎拉·坎贝尔（Sarah Campbell）和她在Continuum/Bloomsbury学术出版社的继任者；我还要一如既往地感谢我无与伦比的“私家”编辑与对谈人伊莱扎·塞古拉-霍兰德（Eliza Segura-Holland）。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比奇市

作者注：文中紧接引文而注的所有参考书目页码，除非另有说明，皆为《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的页码。

Deleuze and Guattari's A Thousand Plateaus: A Reader's Guide, by Eugene W. Holland, ISBN: 9780826423023

© Eugene W. Holland, 2013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版贸核渝字(2014)第 135 号

目 录

致 谢 /iii

1 《干高原》的来龙去脉 /1

2 主题概述 /15

3 文本阅读 /35

4 接受与影响 /153

5 进阶阅读书目 /165

参考文献 /179

索 引 /193

《千高原》的来龙去脉

1972年,德勒兹与加塔利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第一卷):反俄狄浦斯》,联袂登上知识界舞台;并于八年后著成第二卷——《千高原》。此两部作品之间,他们还合著有《卡夫卡:通向一种非主流文学》,这本书对于《千高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是1991年出版的《什么是哲学?》(此后不久,加塔利死于1992年,而德勒兹在1995年自杀);本书涉猎诸多议题,并尤其阐明了他们共享并共同实践了二十年的对何为哲学的理解。这些两人合著的其他著作作为我们对《千高原》的解读提供了重要的文脉,然而,他们各自的专著也同样重要,尤其是德勒兹的专著。德勒兹仅年长加塔利五岁,但1969年两人相识之时,德勒兹已经是知名的哲学家,著作备受赞誉,作为法国最重要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中的一员声名鹊起。其实,德勒兹吸引加塔利的一个原因(是加塔利主动提出要认识德勒兹的)也正是德勒兹对西方哲学了如指掌。而加塔利,在他们初相识时,虽然只有聊聊数篇学术文章发表(以及大量新闻体裁的文章),他却不仅已经是权倾一时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明星学徒,并且与人联合执掌法国最激进

- 2 的精神科诊疗院¹，同时，他还是一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其实，最终是德勒兹表达出合作意向。双方都感到对方能帮助自己在独木难支的领域推进自己的工作，这独一无二又异常具有生产力的合作为我们带来了 20 世纪最令人惊叹而又重要的哲学著作。接下来，在简要介绍两位作者的生平之后，我将把《千高原》置入其历史与哲学的文脉之中进行考察。

吉尔·德勒兹

德勒兹 1925 年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二战”期间读高中时，他先后着迷于文学与哲学，并于 1948 年获得哲学教师资格。在高中 (*lycée*) 从教数年后，德勒兹执教于索邦大学，1960 至 1964 年间供职于 CNRS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其后又重返教学工作，在里昂大学任教直至 1968 年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之后在颇具实验性的巴黎文森大学获得教职，并执教至 1987 年退休 (一同在此执教的还有米歇尔·福柯、加塔利和拉康等人)。

早在 1960 年代，德勒兹和雅克·德里达就已经是最重要的后结构主义“差异哲学家”——坚持主张差异 (*difference*) 与生成 (*becoming*) 应该优先于同一 (*identity*) 与存在 (*being*)，个中缘由，我将在下文中陆续考察。但是，更年轻的德里达的出发点其实是存在主义现象学 (埃德蒙德·胡塞尔，马丁·海德格尔²)，而德勒兹则避开它们，在他看来存在主义和现象学都太自我中心。德勒兹的出发点，其实是他对一些当时并非主流的哲学家的潜心研读，尤其是巴鲁赫·斯宾诺莎、弗里德里希·尼采和亨利·柏格森³。或许

1 即拉博德 (La Borde) 诊疗院。——译者注

2 埃德蒙德·胡塞尔是一位 20 世纪的数学家与哲学家，现象学的奠基人；马丁·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学生，他发展出了一种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哲学。

3 巴鲁赫·斯宾诺莎是一位近代荷兰犹太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是 19 世纪晚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是 20 世纪早期法国哲学家。

可以公允地说,是德勒兹在法国哲学中恢复了这些非同寻常的哲学家的重要性。就尼采而言,尤其如是,德勒兹通过其1962年的《尼采与哲学》将尼采引介到法国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是德勒兹试图剑走偏锋地从最重要的欧洲启蒙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那里攫取哲学资源:德勒兹不仅写专著论康德,而且纵观其整个哲学治业,康德一直处在德勒兹哲学视域的中心。在德勒兹看来,他的哲学事业不过是要完善康德的批判蓝图,其方法是用作为生命创造形态的现实经验的实在的发生(real genesis)来取代所有可能经验所指向的那个先验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关于这个发生(genesis),第2章会作简要介绍。卡尔·马克思是另一位对德勒兹具有重要意义的主流西方哲学家,当大多数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摒弃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德勒兹和加塔利仍然坚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去世前不久,德勒兹似乎就在写一本有关“马克思的伟大之处”(Grandeur de Marx)的书。关于德勒兹,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了解,尽管他自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然而,他的一些重要的关于“思”的研究却是在哲学领域之外完成的——尤其是在文学、绘画和电影领域——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从哲学之外异常宽广的领域为他的哲学攫取资源,包括人类学、数学和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

菲利克斯·加塔利

加塔利的人生故事则更加波折。1930年出生后,整个年少时期,他的家族都在举步维艰地经营一些小生意,不少生意后来都失败了,他目睹了祖父的死亡,心灵受到了重创。“二战”结束时,他在政治上已经十分活跃,果断放弃哥哥推荐的药学学业以投身政治新闻业和激进运动,而后又在拉康的指导下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很快,他便成为拉康的得意门生,可是在其事业刚开始不久,

他就离开拉康的护佑,和精神科医生让·乌黑一道掌管地处拉博德的一家观念激进的精神科诊所。公允地说,虽然在遇到加塔利之前,德勒兹的写作已经大量涉及精神分析(尤见于《意义的逻辑》中),但《反俄狄浦斯》的一个真正的驱动力其实来自于加塔利所展开的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批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虽然在遇到加塔利之前,德勒兹已经将马克思整合进了自己的哲学视域之中(尤见于《差异与重复》),但他们首次合作中大量的对政治经济学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来自于加塔利和他在1960年代的法国作为托洛茨基派积极活动分子的经验。我们确实也可以把他们的这第一次合作,《反俄狄浦斯》,理解为一种整合了政治与哲学的对法国1968年五月剧变的反思——某些反思的灵感毫无疑问来自于德勒兹在巴黎大学激进的文森校园的教学经历,某些反思则与加塔利的激进活动分子的经历相关。

历史脉络

说1968年五月“事件”,或1968年五月剧变,甚或1968年五月出人意料的几乎席卷全法的大罢工,都可能只是一种轻描淡写,要知道德勒兹和加塔利就是在这样充满政治与社会剧变的时代里长大的,包括德国的占领时期(German Occupation)和法国“二战”期间的抵抗运动(French Resistance),还有法国的经济重建和现代化,以及1950、19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萨特与政治联姻的哲学对两个年轻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在德勒兹和加塔利那儿情况有所不同(德勒兹谈哲学,加塔利谈政治)。由于诸多原因,包括法国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法国在1940、1950年代迅速的再工业化,直到1980年代,工会和法国共产党在法国政治文化中仍然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千高原》恰在此时问世。因此,和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无论是哲学的还是

政治的,亦或二者兼备的,对于法国知识分子和激进人士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1968年五月却几乎令法国共产党完全猝不及防:最后工人们自己加入了学生运动(和大部分法国社会其他阶层一道),工会是很久以后才表示支持的,而法共则连支持的态度都未曾表达过。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第一次合作,《反俄狄浦斯》,常常被描述为是1968年五月的产物,它试图在任何其他政治哲学都无能为力时对这些事件作出解释——这样说确实很贴切。然而,他们的合作却远不止于此。就在《反俄狄浦斯》出版三年后,也就是1975年,他们写卡夫卡的书问世,再过一年,一篇谈论根茎(rhizome)的长文问世,这篇长文成为四年后(1980)出版的《千高原》的第一座高原。尽管在合作之余,两人也各自有独立创作,但他们合作完成的《什么是哲学?》(1991)仍然位居两人晚期重要著作之列,如德勒兹的论文集《批评与诊断》(1993)、加塔利的《三种生态学》(1989)和《混沌系(界)》(1992)。

5

哲学脉络

在他们的首次合作(《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引入了一整套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尼采、柏格森和荣格那里获得的概念资源,加塔利则带来了从马克思、叶尔姆斯列夫和拉康那儿汲取的极为宝贵的资源。¹ 在真正遭遇精神分析学之前,德勒兹早已通过对休谟、尼采、柏格森和荣格的研究而发展出一个无意识的哲学概念,它包含本能(来自休谟和荣格的理论)、生命冲动(*élan vital*;来自柏格森)和权力意志(来自尼采),并强调无意识只能通

1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是17世纪晚期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大卫·休谟是18世纪苏格兰经验主义哲学家;卡尔·荣格是20世纪早期的一名精神病学家,仅次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创始人;路易·叶尔姆斯列夫是20世纪丹麦语言学家,他进一步发展了不少索绪尔的重要概念。

过,也只能在其历史的诸体制和原型的偶然表达中,才能获得理解。本能与体制是如此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以至于本能从来不会显现为其自身,与此同时,任何本能都可以在不同的体制形态下表达自身。最终,个体性的心理治疗变得和体制的、社会的变革无法区分、无从分割(正如加塔利,出于他自己的考量,在拉博德诊所所强调的那样)。作为对康德主义批判的践行计划的一部分,《反俄狄浦斯》的首要目标就是用被称作精神分裂分析的“革命性的唯物主义精神病学”取代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对精神分裂分析而言,无意识不是如语言那般被构造的(像拉康所认为的那样),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的能量欲望(desiring-energy)的场所,这一生命对能量的欲望曾被称作权力意志、生产力和力比多。

- 6 其实,使得这一生命能量被一分为三的是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盛行,而且这三者总是与自身相违背,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才要求一并将创造性从信仰死后升天的苦行主义和过分狭隘的科学的现实原则(按尼采的观点)中解放出来,将生产力从资本剥削(按马克思的观点)中解放出来,将力比多的欲望从俄狄浦斯的压抑(按弗洛伊德的观点)中解放出来。

精神分裂分析在三个重要方面推进了康德的计划,并以与尼采和马克思的融合告终。通过将批判¹的对象设定为我们现实经验的实在的发生,而不是所有可能经验的条件,德勒兹和加塔利得以将康德的知性的综合转化为无意识的被动综合。基于他所谓的认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²,且以理性之名而论,康德声称,意识心灵是通过一套特定的程序(他称作“摄取的综合、再造的综合和

1 康德式的批判。——译者注

2 这个哥白尼的类比恰当地引发了大量争议,但康德确实坚持认为,关于对象的可靠知识必须与人类主体用以生产知识的各种官能一一对应,而不是直接与对象自身的内在固有属性相关联。

再认的综合”)来获得知识的,他还进一步强调,知识必须与这些对于意识思维来说是构成性的,它们因此就能提供一种内在的标准以判断知识的有效性,对这三种综合的合法使用得到的知识便是有效的,否则便是无效的。在一个相近的意义上,就欲望,尤其是精神分裂的欲望而不是就理性而言,德勒兹与加塔利强调,无意识也是根据特定的一套综合来运转从而加工并构成经验,而精神分析则必须符合这些程序,否则便是无效的。第一个转化将康德的综合变成被动的无意识的综合,而第二个转化则将无意识的处所从个别的主体替换为一个主体所隶属的历史中的特定的群体及其社会构成。这样一来,无意识便成为某种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但这个集体无意识并不是普遍而永恒的,它总是与处在特定历史中的群体及体制相关涉的。其结果是,最终,批判不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批判,而变成彻底的社会批判:最终,精神分裂分析将精神分析判定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反映或投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病学的精神分裂分析,不仅要求精神分析的理论遵循无意识的综合,而且所有社会关系都应该符合无意识综合。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精神分裂分析是革命性的,而精神分析则不是。然而,此处德勒兹和加塔利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还有一个尼采主义的根基:社会的理想不是要最大程度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尽可能少地违背无意识的“逻辑”、尽可能少地阻挠身体的力量的升腾;革命的社会也必须遵从这些无意识的进程,否则便是压抑的。

在《反俄狄浦斯》中,生产力与力比多之间的联接是通过对两个术语阐发来构筑的:欲望-生产(desiring-production)和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带连字符号的这个术语已经不言而喻:欲望-生产已经包含了生产力和力比多,而且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所做的历史分析也表明是资本主义使这两者彻底分割开来。

辖域化、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这套术语,则分别意指能量在身体和经济的特定领域的投注,对这一能量投注的撤销以及能量在别处的再投注,这样一来精神分析便与政治经济学关联起来。到他们合写《千高原》的时候,这些术语则与层化(stratification)和去层化(de-stratification)相交汇,它们关涉的范围也要宽广得多,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它们将描绘运转中的整个宇宙的进程。

但是在《反俄狄浦斯》中,辖域化与有助于引导能量的投注的编码、去编码和再编码的诸过程相伴。因此,结婚这个行为可以抹去一个年轻小伙作为合格单身汉的状态的编码,同时将他再编码为不能接受其他人的欲望投注;广告通过去编码去年的流行款并将今年的款式编码为“正在流行”,以类似的方式引导消费者的品味和购买行为。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它是建基于市场的,因此,它对一切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进行去编码——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脱出光环”(“strips of its halo”)——并用量化的货币价值取而代之。商品化的确导致剥削,但是,它同时也将欲望从各种社会编码中释放出来,这样一来,由于私人积累,资本不能一如既往地再俘获(re-capture)大量释放出来的自由流动的能量。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声称,他们所说的“精神分裂”——并不是指一种精神疾病,而是去编码的欲望流——就是资本主义的边界,尽管资本还在尽其所能地对精神分裂之流实施再俘获从而不断移动这个边界,无论是将它们再俘获到商品中、体制规范中,还是万不得已将它们请进收容所。他们很谨慎地将精神分裂说成是一个边界,因为欲望从来不会以纯粹形式的方式显现,本能也是如此:它总是必然地通过编码和体制而得以表达,即使这些编码和体制总是偶然的,在历史中变动不居因而容易发生变化的。

德勒兹的代表作,《差异与重复》,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工具用以评估一个既定的对欲望的编码和体制化之中所表达的自由变化的强度:它所关涉的总是一个“重复带来多少差异”的问题。完全由本能决定的行为(比如对好些昆虫来说,一个特定的刺激总是毫无例外地引发同样的反应)所引发的重复不会带来任何差异,德勒兹称之为“空洞的重复”(bare repetition)。人类虽然并不是这样由本能决定(诚如我已说过的),但人的习惯以及神经官能症则在人类行为中引发某种空洞的重复,它有时是有益的,有时却是有害的:习惯作为一种空洞的重复,使我们不必每次做任何事情都徒劳地思前想后一番,但是,我们也有些糟糕的习惯;神经官能症就是一种或多或少不受我们控制的空洞的重复,一种需要通过心理治疗来中断的尤其糟糕的习惯。在哲学中,将同一凌驾于差异之上,将不变的存在(Being)凌驾于流变的生成之上,就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形态的神经官能症,因为存在迫使重复尽可能少地引发差异,并使已经产生的差异或可能产生的差异从属于不变的一。相反,创造性的重复则将差异置于同一之上,重复中差异的程度越高,人的行为就越是自由——精神分裂所指的就是自由的绝对上限。

比如学习演奏一门乐器就要求大量的空洞的重复——例如音阶练习。一旦达到某一熟练程度,便可根据现成的乐谱演奏一支经典曲目了;这事实上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空洞的重复,因为一支现成的曲子,除了少量的“表达的自由”,每次总得按差不多相同的方式演奏。而后,当演奏水平继续提升到又一个决定性的高度时,即兴演奏便成为可能,在此,重复中差异的比率成指数增长,创造性的重复于是取代了空洞的重复。爵士音乐家通常会从一个熟悉的调子开始,然后通过不断用不同的方式演奏它来对它实施去编码——有时甚至把它演奏得面目全非。所谓的“自由爵士乐”则走得更远,它干脆放弃从一个熟悉的调子开始,而直接进入即兴演

奏——这就几乎要抵达精神分裂的外层边界了。在《千高原》中，“解域化”这个术语有取代精神分裂的倾向：爵士音乐家通过围绕一个调子进行即兴演绎来解域它。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相对的解域化是指围绕一个熟悉的调子的和弦进程（或“和弦表”）在一个特定的音调上进行即兴发挥。用复杂性理论的话来说，音调就好比一个“吸引域”（basin of attraction），它指定哪些音与和弦（比如主和弦、属和弦和下属和弦，小七和弦和小三和弦）充当“吸引子”（attractors），即兴演奏围绕它们而展开。爵士音乐家也可能出乎意料地变调，在即兴表演的过程中，陡然从一个调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调上（仍然保留其和弦进程）——相当于改变了吸引域：这便是绝对的解域化。在极端情况下不遵循任何和弦表、甚至不考虑任何可识别的调号的自由爵士乐，就是一些连贯的绝对的解域化，一条创造性的逃逸线。这时，即兴表演的挑战就是要将重复中的差异最大化，最大程度地对一只曲子进行绝对地解域，与此同时仍然保持其作为一首乐曲的坚实性。保持或创造坚实性而不将一致性、统一性和组织强加其上，也即不诉诸同一的空洞的重复，确实可说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所有工作的最终目标，无论是伦理、政治还是美学。他们承认习惯的好处和体制的重要性，尽管两者都束缚了重复中的差异，他们的理想则是将差异最大化，以实验的方式参与到变化之中，离开曲调的舒适区，正如他们所说（311），也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即兴地融入世界之中。

在《反俄狄浦斯》出版后的几年里，三个重要文本相继出版：包括两个合写的作品——《卡夫卡：通向一种非主流文学》（1975）和《根茎》（1976），还有一本德勒兹的专著《普鲁斯特与符号》（1976）也再版（第三版）发行，和第二版（1970）一样，它体现了加塔利对德勒兹思想的不断增强的影响。根茎这座高原暂且留待后文再议，在此，我想简要介绍一下这两部关于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文学研